

结构、文本、叙事： 《十二诸侯年表》与《史记》编纂新论

赵四方

【提要】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上起共和元年(前 841),下迄周敬王四十三年(前 477),谱列 365 年间的历史变化。《年表》中的诸侯次序显然经过司马迁的精心考虑,它之所以与《世家》的顺序不同,源于司马迁采取了表面有异而实则相辅相成的排序标准。详考《年表》的文本内容,会发现《年表》与相关《本纪》《世家》在多方面呈现出同构性。以《年表》为基础,司马迁在相关《本纪》《世家》中“嵌入”了大量叙事文本,对这类“嵌入型文本”的详细信息不仅可以促进《史记》编纂过程的研究,而且有助于我们对司马迁关于“十二诸侯”的历史叙事主线进行考察。在结构、文本与叙事的视角下,《年表》与相关《本纪》《世家》的关系可以获得一种新的解读。

【关键词】 《史记》 《十二诸侯年表》 结构 文本 叙事

作为《史记》“十表”中的第二表,《十二诸侯年表》简要记述了从共和元年(前 841)至周敬王四十三年(前 477)的历史。^① 此前学界对该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它对历史变迁大势的表现功能以及相关史事的年代考证上,^②但对于该表与《史记》相关篇章的结构异同和文本关联,以及与“十二诸侯”历史叙事主线的内在联系,则重视不足。本文在多方面统计的基础上对《年表》进行重新考察,力图在与《史记》相关篇目的互证中,揭示二者在历史编纂和历史叙事上的相辅相成关系。

一、《十二诸侯年表》基本结构辨析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历史时间。这一点不仅可从《史记》时间

① 此下简称《年表》。但在涉及《三代世表》《六国年表》的讨论时,则仍称《十二诸侯年表》。

② 古代学者如刘知幾、吕祖谦、茅坤、方苞、梁玉绳、潘永季等,对《年表》表现历史盛衰的功用皆有评析。近现代学人在这方面的研究更多,主要有徐复观:《论〈史记〉》,见徐氏著《两汉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韩兆琦:《〈史记〉十表总论》,《上海大学学报》2006 年第 6 期,第 37—46 页;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张大可:《论〈史记〉十表之结构与功用》,见张氏著《史记研究》,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第 306—320 页;赵生群:《〈史记〉编纂学导论》,凤凰出版社 2006 年版;张新科:《大一统:〈史记〉十表的共同主题》,《学术月刊》2003 年第 6 期,第 71—76 页。日本学界主要有伊藤德男:《史记十表に見る司马迁の历史观》,平河出版社 1994 年版。西方汉学界则有 Grant R. Hardy(侯格睿),“The Interpretive Function of Shih Chi 14, ‘The Table by Years of the Twelve Feudal Lord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13, 1993, pp. 14—24; Michael Nylan(戴梅可),“Mapping Time in the Shiji and Hanshu Tables”,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No. 43, 2016, pp. 61—122。有关《年表》中的史事考订,可参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九州出版社 2011 年版;罗倬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考证》,商务印书馆 1943 年版;刘操南:《史记春秋十二诸侯史事辑证》,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等等。

范围的自我陈述可以看出,而且在《本纪》《世家》《列传》的篇目排列上,也可以得到大体反映。对于《本纪》的名称,张守节说:“纪者,理也,统理众事,系之年月,名之曰纪。”^①刘知幾也说:“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②可见“纪”本身就具有依时间条理来陈列事件的意味。《本纪》《世家》对历史时间的整合,纳入了地域和国别的维度。至于《列传》编排,也大致依照时间顺序展开,即使是某些“合传”与“类传”,也因传主之间的主从区别而大体符合时序特征。

能够说明司马迁时间意识的最佳证据便是《表》体的制作。《三代世表序》说:“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③《六国年表序》也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④这表明,时间正是司马迁撰写《史记》时的基本关切所在。由于历史文献对年月的记录有详有略,有载有失,所以司马迁制作“十表”,借以整理年岁的参差不齐,进而揭示不同时空下历史事件的先后顺序。正如美国汉学家侯格睿(Grant R. Hardy)所言,司马迁对于时间的精确性有一种执着的追求,^⑤其目的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有条理的历史叙事。

《十二诸侯年表》上承《三代世表》,下启《六国年表》,三者在时间上首尾相接。《年表》从首至尾365年无一年中断,即使某年各国均未有史事记载,亦皆以空格示之。该表首栏系以周天子纪年,此下分别是各诸侯纪年,逐年对应,不相淆杂。时间要素的统率作用非常明显,离开了这一要素,《年表》的制作不可能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年表》的另一要素为空间。“周”栏之下,依次为“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吴”13栏。这一空间顺序与《世家》之间有明显分歧。前人指出,从首篇《吴太伯世家》到第12篇《郑世家》,依据的原则大致是诸侯的分封时间,同时兼顾封臣的亲疏与功劳。^⑥其实对于此点,司马迁已有明确提示,他说:

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受封。^⑦

从“封尚父于营丘”至“封弟叔度于蔡”,次序与《世家》完全相合。由“余各以次受封”一语,也可以大致推测出分封时间是《世家》排序的重要标准。因而,前12篇《世家》的结构大致如表1所示:

① 司马迁:《史记》卷1《五帝本纪》,中华书局2014年版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第1页。

② 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46页。

③ 《史记》卷13《三代世表序》,第623页。

④ 《史记》卷15《六国年表序》,第836页。

⑤ Grant R. Hardy, “The Interpretive Function of Shih Chi 14, ‘The Table by Years of the Twelve Feudal Lords’”, p. 17. 《史记》对于时间的记载并非没有错漏之处。近代以来许多学者如钱穆、陈梦家、杨宽、武内义雄、平势隆郎等,都指出《表》体中不乏时间错误,其中尤以《六国年表》为最。

⑥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57页;董成龙:《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史记〉中高祖立朝至武帝立教的大事因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3—34页。

⑦ 《史记》卷4《周本纪》,第163页。

表1 前12篇《世家》次序结构^①

分封时间	世家篇目	封臣身份
周武王时	吴太伯世家第一	王室
	齐太公世家第二	功臣
	鲁周公世家第三	王室兼功臣
	燕召公世家第四	功臣
	管蔡世家(曹世家附)第五	王室
	陈杞世家第六	圣裔(舜、禹)
	卫康叔世家第七	王室
	宋微子世家第八	圣裔(汤)
周成王时	晋世家第九	王室
	楚世家第十	圣裔(顓頊)
(未详何时封)	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	圣裔(禹)
周宣王时	郑世家第十二	王室

如果将《年表》与表1进行对比,则会发现很大不同。毫无疑问,《年表》次序已完全打破了分封时间这一基本标准。那么《年表》的排序标准又何在?我们首先对从周至吴14栏的记事年数进行了全面统计(“某君元年”的纯纪年性记载皆不计入),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年表》记事年数分国统计

序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国别	周	鲁	齐	晋	秦	楚	宋	卫	陈	蔡	曹	郑	燕	吴
记事年数	36	113	78	124	52	97	55	52	33	22	22	81	10	32

侯格睿曾对《年表》中的记事做过一次统计,虽然和本文的统计单位与数据有一些差别,但他正确地指出了记事量与各国的地位、实力有一定的关系。^②例如周的记事年数仅36年,在全表中属于偏少者,这与周王室的地位较为相符。而且联系《六国年表》来看,周在《六国年表》中的记事年数只有8年。这说明司马迁在制作《表》体时充分考虑到了周王室的权威日坠。至于陈、蔡、曹、燕、吴,或国力有限,或偏居一隅,对于天下大势的主导权较弱,这在它们的记事年数上同样可以反映出来。再如齐、晋、楚、郑的记事年数,在全表中属于偏多者,这与它们的国力和地位大致相当。其中郑国为后数国中记事年数最多者,这应当与春秋前期郑国的重要地位有关。所谓“周之东迁,晋郑焉依”,^③而正式拉开诸侯争霸序幕的正是郑庄公。

鲁国的记事年数多达113年,与它的地位、实力极不相称。原因之一在于,从史料来源上看,《年

① 本文并未对全部《世家》进行讨论,只是重点讨论《年表》所涉之各诸侯国,即从《吴太伯世家》至《郑世家》12篇。此下战国诸侯及汉初功臣等《世家》,因与《年表》关系较弱,暂不拟讨论。表1制作参考了董成龙《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第33—34页的“《史记》三十世家篇章安排”表。

② 据侯格睿以“史事条目”为单位的统计,《年表》记事周38则、鲁113则、齐82则、晋121则、秦54则、楚103则、宋58则、卫57则、陈37则、蔡30则、曹36则、郑80则、燕24则、吴37则。见Grant R. Hardy, “The Interpretive Function of Shih Chi 14, ‘The Table by Years of the Twelve Feudal Lords’”, pp. 19—20。笔者统计结果与此大致相符,但鉴于《年表》同年同栏的部分史事既可视为一事也可视为二事,故笔者选择以“记事年数”为单位,接近下文藤田胜久所说的“记事频率”概念。另,上述统计中差别最大者为蔡、曹、燕三国,由于记事甚少,侯格睿的数据显然不够准确,读者可复验。

③ 据杜预《春秋左传集解》,李梦生整理,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页。

表》所依赖的《春秋》和《左传》皆有鲁国史书的性质,此即鲁国的一大特殊性所在(有关鲁国在“十二诸侯”历史叙事主线中的特殊性,详本文第三节)。明末清初的傅占衡说:“《十二诸侯表》据《春秋》而次者也,《六国表》据《秦纪》而次者也。”前者“以鲁为主”,后者“以秦为主”。^①因而,正如《六国年表》中秦国不在“六国”之内一样,《十二诸侯年表》中的鲁国也不当算在“十二诸侯”之列。有关《年表》“殊鲁”“殊秦”“殊吴”的三种观点,表2的统计数据显然支持“殊鲁”说。^②

秦国的记事年数数量居中,并无特殊性可言。但需要指出的是,《六国年表》中的情形与此大有不同。据刘俊男统计,《六国年表》各国之纯记事数远逊于秦国。^③日本学者藤田胜久也指出“秦”栏记事最多:“大体来看,《六国年表》的排列接近于记事频率的次序,或是和秦国相距远近的次序。”^④既然司马迁在《六国年表》中以秦为核心国家,而且他意欲撰表以“综其终始”“原始察终”,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十二诸侯年表》中的秦国?

其实,司马迁在序文中明确说出了对秦国的定位:“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国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⑤这里的“四国”显然是并列关系。另据《郑世家》载:

公(郑桓公)曰:“周衰,何国兴者?”(太史伯)对曰:“齐、秦、晋、楚乎?夫齐,姜姓,伯夷之后也,伯夷佐尧典礼。秦,嬴姓,伯翳之后也,伯翳佐舜怀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尝有功于天下。而周武王克纣后,成王封叔虞于唐,其地阻险,以此有德,与周衰,并亦必兴矣。”^⑥

此段通过“预言叙事”的方式,说明周王室衰落后齐、秦、晋、楚四国走向兴盛。不论此处预言究竟是实出太史伯之口,还是司马迁假太史伯之口来表达自身的历史观察,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司马迁描绘的“四国”并兴态势。《周本纪》中说:“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⑦《齐太公世家》在叙述葵丘会盟后也说:“是时周室微,唯齐、楚、秦、晋为强。”^⑧显然,司马迁将齐、晋、秦、楚塑造为周衰之后诸侯崛起的典型。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年表》将上述四国与其他诸侯有意做了区分。在《世家》排序中彼此不相联署的齐、晋、秦、楚,在《年表》中获得了结构上的关联性。

《年表》中四国次序与齐桓、晋文、秦穆、楚庄的称霸顺序相协,但同时需要注意到与它们的爵位次序一致(齐、晋为侯,秦为伯,楚为子)。这种以爵为序的原则,在此下八国的排序上再次体现出来。晚清潘永季指出:“宋至燕以爵叙(原注:宋,公。卫、陈、蔡,侯。曹、郑、燕,伯)。燕封于周初,而顾居郑后者,在春秋时燕之交于中国仅矣。”^⑨潘氏眼光颇为独到,既指出了《年表》中隐含的爵位次序,也

① 傅占衡:《湘帆堂集》卷11,《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95页。

② “殊鲁”说的现代支持者有张大可、韩兆琦等。“殊秦”说的代表是清代学者牛运震以及近人李景星、刘操南等。唐代的司马贞和宋代的苏洵支持“殊吴”说,今人大多已不接受。

③ 刘俊男:《〈史记·六国年表〉与史料编纂》,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第55页。

④ 藤田胜久:《〈史记〉战国史料研究》,曹峰、广濑薰雄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08页。

⑤ 《史记》卷14《十二诸侯年表序》,第647页。

⑥ 《史记》卷42《郑世家》,第2121—2122页。

⑦ 《史记》卷4《周本纪》,第189页。

⑧ 《史记》卷32《齐太公世家》,第1804页。

⑨ 潘永季:《读史记札记》,《丛书集成续编》第21册,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10页。

观察到同样是伯爵的燕国与郑国,其次序乃由与中原交往的频繁程度决定。如表 2 所示,《年表》中燕国的记事年数只有 10 年,为各国中最少者,这充分说明了燕国在天下大势变迁中的边缘位置。

当然,司马迁对这种依爵排序的原则也有暗示。《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云:“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厉幽之后,王室缺,侯伯强国兴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纯,形势弱也。”^①司马迁意欲通过《年表》来反映天下形势强弱的变化,怎么可能不注意五等爵位的先后次序?他又十分留意各诸侯的封地疆域,一云“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②再云“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各四百里”。^③以齐、晋、秦、楚置于卫国等国之前,显然是在说二者对天下大势的影响实有主次之别。

至此,《年表》诸侯次序的基本原则已甚为清晰。如果试将《年表》的结构予以还原,则如表 3 所示:

表 3 《年表》诸侯序位结构

序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国别	周	鲁	齐	晋	秦	楚	宋	卫	陈	蔡	曹	郑	燕	吴
			四国				其他八国							
爵称	天子	侯			伯	子	公	侯			伯			子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序与表 2 中的记事年数大体上是相应的。从此点而论,《年表》所展现出的内容虽称复杂,但编排得当,有条不紊,实可谓精心结撰。《年表》与相关《世家》排序虽有不同,但详考其实,则可见二者的相通。《世家》的排序大体遵循分封次序的先后,表现诸侯拱卫京师之意,而《年表》则重在呈现天下大势的变迁。因而,《年表》与相关《世家》的结构其实呈现出一种相辅相成的统一关系。但即使如此,这两种次序都只是一种表层的结构,它们之间的内部关联及文本互动尚待进一步分疏。

二、《年表》与《史记》相关篇章的结构关联及文本互动

《年表》所依据的主体史料为《春秋》与《左传》,但由于《春秋》记事过于简略,所以《左传》实际上构成了《年表》记事的最主要来源。需要注意的是,《年表》与《左传》的起讫时间实有不同。《年表》起于共和元年(前 841),终于周敬王四十三年(前 477),而《左传》起于鲁隐公元年(前 722),终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 468),二者的重合时间只有周平王四十九年(鲁隐公元年,前 722)至周敬王四十三年(鲁哀公十八年,前 477)间的 246 年。这意味着从共和元年至周平王四十八年的 119 年《年表》叙事,司马迁必须在《左传》之外寻找史源,而这部分时间跨度几乎占据了《年表》全部时间(365 年)的三分之一。

倘若以鲁隐公元年作为分界线,将《年表》记事分为“鲁隐公前”与“鲁隐公后”两部分,那么记事年数的差别其实非常明显。此项统计结果见表 4:

① 《史记》卷 17《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第 967 页。

② 《史记》卷 14《十二诸侯年表序》,第 647 页。

③ 《史记》卷 17《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 967 页。

表4 鲁隐公前后记事年数分国统计

国别	周	鲁	齐	晋	秦	楚	宋	卫	陈	蔡	曹	郑	燕	吴
鲁隐公前记事年数	6	2	1	10	5	1	3	3	2	0	0	6	0	0
鲁隐公后记事年数	30	111	77	114	47	96	52	49	31	22	22	75	10	32

《年表》约前三分之一的时空中,有记事的年数可称寥寥,而且从记事内容来看,除了诸侯国君立年、卒年外,鲜有其他史事。这种情况并非存在于某一国中,而是普遍存在于从周至燕的13栏中(吴栏始年晚于鲁隐公元年)。这是否是《年表》对史事进行“选择性记载”的结果?通过对比可以知道,相关《本纪》《世家》在共和元年至鲁隐公元年间的记事也极为有限,而且与《年表》的分歧可以说微乎其微。^①这说明,无论是《本纪》《世家》还是《表》体,司马迁对鲁隐公之前的各国记事均未能充分记载。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应当源于司马迁在制作《年表》与编撰《本纪》《世家》时,至少在鲁隐公前119年间的史事上,依据的是同一批史源,而这批史源的记事内容本身较为有限。进入《左传》所涉及的时期,《年表》记事量明显增多,无疑与《左传》记事的丰富性密切相关。因而,与相关《本纪》《世家》的结构一致,《年表》展现出从共和至鲁隐公期间鲜有记事的特征。这是二者同构性的第一个方面。

二者的同构性还体现在分国文本的对应性上。以《年表》秦国记事与《秦本纪》的关系为例,《年表》秦国记事的概况如表5所示:

表5 《年表》秦国国君在位年数与记事年数对照

秦国国君	秦仲	庄公	襄公	文公	宁公	出公	武公	德公	宣公	成公	穆公	康公	共公	桓公	景公	哀公	惠公	悼公	合计
在位年数	20	44	12	50	12	6	20	2	12	4	39	12	5	27	40	36	10	14	365
记事年数	0	0	3	2	0	1	2	2	1	0	20	3	0	5	7	2	3	1	52

《年表》所记秦国国君共18位,在位时间长短不一,记事年数也差别较大。但有一位国君的记事年数远远超出其他,此即秦穆公。其记事年数占据在位年数的一半左右,同时也占据了秦国记事总年数的三分之一强。需要注意的是,庄公、文公、景公在位时间均较穆公为久,但其记事年数却远逊于后者,而对照《秦本纪》可知,文公、宁公、武公等在位期间的诸多史事皆未能进入《年表》之中,这充分说明司马迁在谱列《年表》秦国记事时,“选择”了穆公作为叙事的中心。穆公一生最重要的事迹,如赈济晋灾、韩地之战、迎送重耳、崤山之败、以人为殉等,几乎都被载入了《年表》之中。至于秦国的其他国君,记事内容则遭到了有意“删汰”。

反观《秦本纪》,有关穆公的文字占全篇四分之一强,如果选取与《年表》相应的时间段,即从秦仲至悼公,那么穆公记事的文字篇幅恰好占一半。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的《秦本纪》小序中说:“维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义,悼豪之旅;以人为殉,诗歌《黄鸟》;昭襄业帝。”^②在春秋时期的国君中唯独表出穆公,以其上承祖先伯翳,下启战国昭襄,用意实不可掩。《年表》秦国记事与《秦本纪》的这种对应关系绝非巧合所致,它说明司马迁努力塑造的秦国中心国君正是秦穆公。

① 如《鲁周公世家》中鲁武公卒于九年,但《年表》有武公十年栏;《宋微子世家》中宋惠公卒于三十年,但《年表》有惠公三十一年栏。此类年岁差异当与诸侯国君“立年改元”“逾年改元”之别有关。参平势隆郎《新编〈史记〉东周年表——中国古代纪年の研究序章》,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5年版。

② 《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第4008页。

这种对应关系还存在于《齐太公世家》《晋世家》等内容当中。《齐太公世家》中记述篇幅最多者为齐桓公，《太史公自序》说：“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诸侯，霸功显彰。”^①在《年表》齐国记事中齐桓公的记事年数共计15年，占据在位年数（43年）近三分之一，涵盖了在位期间的全部重要活动。另外，占《晋世家》篇幅最多者为晋文公重耳，司马迁以大段笔墨叙述了他的流亡生涯，并且自言该篇宗旨为“嘉文公赐珪鬯”。^②由于文公在位时间仅九年，《年表》记事不可称多，但重耳出奔、流亡的记事在献公、惠公、怀公以及他国栏位中多次出现，重耳之名前后提及凡11次。对于个体性的历史人物来说，这样的情况属于特例。如果我们知道另一频频出现于《年表》中的人物是孔子（10次），那么自然可知司马迁对于晋文公的推重。^③

根据以上分析，《年表》记事与相关《本纪》《世家》的内容呈现出结构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一方面体现在从共和到鲁隐公之间鲜有记事，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对某些人与事的着力凸显。前者是史源本身所致，后者则是由于司马迁进行了筛选与编排。由此可知，史事在司马迁那里从来不是“平等”的，司马迁在制作《年表》的过程中，实际上赋予了一些人与事以“优先权”。

问题的关键是，某些史事的“优先权”在相关《本纪》《世家》中有无其他形式的体现？欲回答这一问题，须对《年表》与相关《本纪》《世家》的文本关联有所考察。在这一问题上，古今学人关注较多的是《表》体记录了不见于其他篇章的诸多史事，因而起到了补充史文的作用。这当然有益于对《年表》功用的认识，但二者的文本关系绝不止此。相对于上述这种关系，本文重点探讨《年表》与其他篇章的另一种文本关系。

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在分析《史记》篇目时，依据文本的不同生成方式，曾区分出“独立性篇章”（independent chapters）与“依赖性篇章”（dependent chapters）。前者主要是有关汉代的篇目，来源于司马迁本人的亲身经历或宫廷档案；后者主要是指汉代以前的部分，它们的形成得益于司马迁对先秦及秦代文献的抄撮与整合。^④以传统的术语来说，前者近于“作”，后者近于“述”。这一观点对我们分析《史记》文本极为有益。《本纪》《世家》中存在一些有特殊“整合”痕迹的文本，它们似乎直接来源于《年表》，与所在篇章往往不存在内容相关性，剔除之后也不影响历史叙事的完整性。就内容而言，它们是对其他国家史事的记载，生成方式更像是在完整性故事中的一种“嵌入”。深入考察这类“嵌入型文本”，可以促进我们认识《史记》的编纂过程。

如《管蔡世家》蔡侯世系中有这样一段叙事：

四十八年，釐侯卒，子共侯兴立。共侯二年卒，子戴侯立。戴侯十年卒，子宣侯措父立。宣侯二十八年，鲁隐公初立。三十五年，宣侯卒，子桓侯封人立。桓侯三年，鲁弑其君隐公。二十年，桓侯卒，弟哀侯献舞立。^⑤

① 《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第4013页。

② 《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第4015页。

③ 需要指出，司马迁为了突出重耳，会对《年表》的精确系年原则有所改变。如重耳流亡过曹的年岁，司马迁并未考察出精确系年，但他沿袭《左传》中的追记内容，将此事系于曹共公十六年（前637）。这一系年严格而言是有违史实的，司马迁自己在《管蔡世家》中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梁玉绳对此有过辨析，见《史记志疑》卷8，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6页。

④ William H. Nienhauser（倪豪士），“A Note on a Textual Problem in the ‘Shih chi’ and Some Speculations concerning the Compilation of the Hereditary Houses”，*T'oung Pao*，Second Series，Vol. 89，2003，p. 53.

⑤ 《史记》卷35《管蔡世家》，第1894—1895页。

此处存在一个重复出现的语句结构,即“某侯某年卒,子某侯立”。从釐侯到哀侯,此语句结构共有五组,但该结构在宣侯和桓侯时被迫中断,因为较之其他三组多出了“宣侯二十八年,鲁隐公初立”与“桓侯三年,鲁弑其君隐公”二句叙事。就叙事内容而言,它们与蔡国并不直接相关,显然不是蔡侯世系中的原有文字。而对照《年表》可知,鲁隐公的立年、被弑年与上述蔡侯纪年完全相符。考虑到这两句叙事内容的独特性,它们应当是司马迁从《年表》中移来“嵌入”的结果。

类似的情况出现于《燕召公世家》:

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燕惠侯当周厉王奔彘,共和之时。惠侯卒,子釐侯立。是岁,周宣王初即位。釐侯二十一年,郑桓公初封于郑。三十六年,釐侯卒,子顷侯立。顷侯二十年,周幽王淫乱,为犬戎所弑。秦始列为诸侯。二十四年,顷侯卒,子哀侯立。哀侯二年卒,子郑侯立。郑侯三十六年卒,子缪侯立。缪侯七年,而鲁隐公元年也。十八年卒,子宣侯立。宣侯十三年卒,子桓侯立。桓侯七年卒,子庄公立。^①

上述语句结构再次出现,只是出现了严重“断裂”,不易分辨。但如果将周王室与其他诸侯的叙事剔除,则会发现只剩余燕国世系。对比《年表》来看,上述这段文字中的所有“非燕国叙事”,与《年表》中的年岁完全相合。尤其是“缪侯七年,而鲁隐公元年也”这样的郑重表述,只可能是排列《年表》后得出的一种“整理年差”的结果。显然,司马迁在将《年表》中的某些记事“嵌入”燕国世系之中。

还有一些“补记”内容可以帮助认识文本的“嵌入”过程。如《左传》“栾书弑晋厉公”一事发生于鲁成公十八年(前573),《年表》将其记于晋厉公八年(前573)栏,且在《秦本纪》《齐太公世家》《管蔡世家》相应年数下都特意言及。尤需注意者,为《鲁周公世家》对此事采取了“补记”:

(鲁成公)十八年,成公卒,子午立,是为襄公。是时襄公三岁也。襄公元年,晋立悼公。往年冬,晋栾书弑其君厉公。四年,襄公朝晋。^②

此处所谓“往年”,指鲁成公十八年。依《史记》叙事习惯,“晋栾书弑其君厉公”应书于成公十八年下,但此处书于襄公元年下,以“往年”作提示语追叙之。梁玉绳曾对这种做法深致不满:“《世家》于各国之事有附书在当年者,有追书往年者。挂一漏万,殊无义例。”^③梁氏批评不免苛刻,却敏锐地指出所谓“往年”云云,源自一种补记。而这种补记恰恰表明,“晋栾书弑其君厉公”正是司马迁“嵌入”的文本,剔除它之后,叙事仍旧是连贯的。

同样的例子还有《秦本纪》中“孔子卒”一事:“秦悼公立十四年卒,子厉共公立。孔子以悼公十二年卒。厉共公二年,蜀人来略。”^④依一般叙事习惯,应先书“悼公十二年,孔子卒”,再叙“悼公十四年卒,子厉共公立”。但此处却在“厉共公立”之后补记“孔子以悼公十二年卒”。据《年表》可知,孔子卒年正当秦悼公十二年。显然,它并非直接抄撮自《左传》或秦国原有史料如《秦记》等,而是司马

① 《史记》卷34《燕召公世家》,第1877—1878页。

② 《史记》卷33《鲁周公世家》,第1858页。

③ 梁玉绳:《史记志疑》卷17,第836页。

④ 《史记》卷5《秦本纪》,第251—252页。

迁从《年表》中特意移来的。作为《本纪》《世家》中补记“孔子卒”的唯一一例，它最能体现出文本的“嵌入”过程。此外，如《管蔡世家》曹国叙事说：“戴伯元年，周宣王已立三岁。”^①显然，“周宣王已立三岁”也属于追叙，这种叙事方式的特殊性证明它绝非曹国世系中的原有记载，而是司马迁从《年表》中观察并移来的（据《年表》，周宣王三年正与曹戴伯元年相合）。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嵌入型文本”在大部分诸侯《世家》中都较为常见，但唯独在《陈杞世家》杞国叙事中几乎没有出现，这使得杞国国君从东楼公至简公的“某公某年卒，某公立”的重复语句结构保存得相当完整。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在于“杞小微，其事不足称述”，^②但从文本生成的角度而言，恐怕与杞国叙事不具备嵌入文本的条件有关。《年表》中并无杞国栏位，这直接导致司马迁不能将杞国与他国的记事年岁进行比照，进而也就不能得心应手地将他国记事予以“嵌入”。《年表》中的失载与《世家》中的特例绝非巧合，它恰恰说明了《年表》在“嵌入型文本”生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因而，司马迁在撰写《管蔡世家》《燕召公世家》《鲁周公世家》《秦本纪》时，必然利用了《年表》的相关工作。易言之，《年表》在上述篇目撰写时至少已部分完成。^③从这点而言，《年表》的原始功能理应包括对《史记》编纂的辅助，如果脱离《年表》中时间要素的支撑，相关《本纪》《世家》不可能以今天的这种样貌呈现。“嵌入型文本”是《年表》与其他篇章的重要关联点，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对我们考察《年表》的功能，以及它与其他体裁的关系无疑都有裨益。

三、“嵌入型文本”与《史记》春秋叙事的主线

毫无疑问，所有的“嵌入型文本”都经过了司马迁的“选择”。那么司马迁是以何种标准进行选择？这些被选择出的“嵌入型文本”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能帮助我们认识《史记》的编纂意图？最先注意到这一问题的应当是明代的黄淳耀。他说：

太史公诸《世家》叙诸侯事，而王室始乱，伯主代兴，皆谨书之。如厉王之奔，宣王之立，幽王之弑，周东徙洛，秦始列为诸侯，小白、重耳、宋襄、楚庄之立卒，与申生之杀及敌国相灭，各国臣子之弑其君，皆三致意焉。而于孔子之生卒及相鲁尤详。至书“鲁隐公初立”者，以为作《春秋》地也。此等义例，皆不愧良史。^④

黄氏意识到司马迁以某种“义例”对一些史事反复书写，其实已经接近本文所谓“嵌入型文本”的概念。虽然他对这类史事尚未仔细分疏，个别判断也有不准确之处，但这种眼光堪称敏锐。^⑤

① 《史记》卷35《管蔡世家》，第1899页。

② 《史记》卷36《陈杞世家》，第1916页。

③ 据司马迁《报任安书》，五体次序为：十表、十二本纪、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这应当是《表》体较先完成的一个直接证据。待全书编定后，“十表”才移于《本纪》之下。此点承匿名评审专家提示，谨致谢忱！另外，有学者在考察《六国年表》后也认为：“（《六国年表》）应该是作成于《世家》之前，而非从《世家》所抄录。”与本文观点可相印证。参见刘俊男《〈史记·六国年表〉与史料编纂》，第116页。

④ 黄淳耀：《陶庵全集》卷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88页。

⑤ 黄氏之后，钱大昕、梁玉绳、赵翼、刘咸炘、柳诒徵等人都对这一问题有过关注。近来有学者对这种“迭见法”进行了系统研究，但并未对《年表》与这种“迭见法”的关系进行论述，考察对象、方法与视角均与本文存在较大差异。参见王振红《〈史记〉“迭见法”考论》，《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4期，第15—24页。

按照《年表》中的时间及国别顺序,我们将相关《本纪》《世家》中出现频次较高的若干“嵌入型文本”摘出,列表6(△表示有记事,▲表示该事在《年表》中的栏位):

表6 较高频次“嵌入型文本”分国统计

记事内容	周	鲁	齐	晋	秦	楚	宋	卫	陈	蔡	曹	郑	燕	吴
周厉王出奔彘	▲	△	△	△	△	△	△	△	△	△	△		△	
共和行政	▲	△	△	△				△		△			△	
周宣王即位	▲	△	△	△	△	△	△	△	△	△	△		△	
犬戎杀幽王	▲	△	△	△	△	△	△	△	△	△	△	△	△	
周东徙洛	▲		△	△	△	△			△	△	△			
秦始皇列为诸侯		△	△	△	▲	△	△		△	△	△		△	
鲁隐公初立	△	▲	△	△					△	△	△		△	
鲁弑其君隐公	△	▲	△	△	△	△	△	△	△	△	△			
齐桓公始霸	△	△	▲	△	△	△	△				△	△	△	
齐桓公卒	△	△	▲		△		△	△	△	△				
晋文公立		△	△	▲	△		△							
晋文公卒	△		△	▲	△		△	△			△			
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		△			△	▲	△		△	△		△		
秦穆公卒	△		△	△	▲		△	△	△	△			△	
楚庄王立				△		▲	△		△	△				
楚庄王卒	△			△		▲			△	△				
晋栾书弑厉公	△	△	△	▲	△						△			
齐崔杼弑庄公	△	△	▲	△									△	
晋六卿强而公室卑				▲	△							△	△	
孔子相鲁		▲		△	△	△								△
齐田常弑简公	△	△	▲	△	△		△		△	△		△	△	△
孔子卒	△	▲		△	△			△	△			△	△	

这类“嵌入型文本”在阅读过程中极易被忽略。经统计可知,尽管它们未必在从周至吴的篇章中全部出现,但可以肯定的是,司马迁在有意提醒读者,这类文本是他进行历史叙事时不可绕开的重要环节。

欲考察这类文本的选择过程,须从《十二诸侯年表》及其与《三代世表》《六国年表》的关系入手。“共和行政”是《三代世表》的时间终点,也是《十二诸侯年表》的时间起点。司马迁自言《世表》记“黄帝以来迄共和”,《年表》“自共和迄孔子”。^①显然,二表的分界点在于“共和行政”,而此分界点是司马迁“制造”出来的。他说:

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呜呼,师摯见之矣!紂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及至厉王以

^① 《史记》卷13《三代世表序》,第624页;卷14《十二诸侯年表序》,第649—650页。

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后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扶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①

“废书而叹”的时间点正是周厉王。司马迁之所以重视该时间点，是由于他将“厉王出奔”视为周代历史上第一次大的祸乱。这一祸乱的远源在此前已有所隐伏，如周昭王时“王道微缺”，周穆王时“王道衰微”，周懿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②但司马迁认为这些都不足以构成一种“转折”，及至厉王出奔，“乱自京师始”，周室才真正由盛转衰。由此“厉王出奔”与“共和行政”的转折意义就凸显出来了。

幽王时的犬戎之祸是司马迁所认为的第二次大祸乱，此事不仅导致京师再次动荡，而且使周室被迫东迁。此事之前，司马迁以伯阳甫之口两次说出“周(将)亡矣”，^③说明他认为周室衰亡在幽王时已呈不可挽回之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幽厉以后”才成为司马迁笔下“周史盛衰变化升降的关键时刻之语言”，^④而“厉王出奔彘”与“犬戎杀幽王”对于周代全局性的影响使其具备了几乎从未缺席的“嵌入型文本”资格。“共和行政”作为“厉王出奔彘”的直接结果，开启了“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的霸政时代。《年表序》中的“是后”云云，便是指“共和行政”之后而言。而“周宣王即位”之所以能成为“嵌入型文本”，则因宣王能够“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使得“诸侯复宗周”，^⑤代表了“周道”的最后一抹余晖。这与司马迁多处表达的“尊周”之意是相符的。^⑥

周室东迁过程中，勤王有功的秦襄公成功跻身诸侯之列。《年表》秦襄公七年(前 771)记载“始列为诸侯”。^⑦这一文本出现于《周本纪》《秦本纪》以及多篇《世家》之中。《六国年表序》说：“太史公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畴用事上帝，僭端见矣。”^⑧襄公的“僭越”当然是周道衰微的表现，但司马迁反复书写“秦始列为诸侯”，原因尚不止此。《六国年表序》下文说：“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⑨此处着力突出献公，而不是突出力求变革的孝公、奠定帝业的昭襄王，与司马迁对历史连续性的追求有关，因为正是在献公时期，太史儋向献公说出了“周故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岁复合”的预言。^⑩因而，司马迁在《史记》中反复书写“秦始列为诸侯”，更重要的目的则是与日后的“秦灭周”以及“并天下”，搭建起历史叙事的连续性。如果说“秦灭周”和“并天下”是一种“终”，那么它对应的“始”正是“秦始列为诸侯”。司马迁对于文本的选择与拼接，充分考虑到了如何塑造历史的“断裂”与“延续”。

司马迁显然重视齐桓、晋文、秦穆与楚庄这四位霸主，对其立年与卒年反复书写，而对“齐桓公始

① 《史记》卷 14《十二诸侯年表序》，第 647 页。

② 《史记》卷 4《周本纪》，第 172、178 页。

③ 《史记》卷 4《周本纪》，第 184、186 页。

④ 李纪祥：《从宗周到成周：孔子与司马迁的周史观》，《历史研究》2014 年第 2 期，第 12 页。

⑤ 《史记》卷 4《周本纪》，第 182 页。

⑥ 司马迁的尊周思想在《史记》多处都有反映。仅从《年表》记事来看，以周襄王二十年(前 632)“王狩河阳”的记载最具代表性。这是承袭《春秋》而来的一则耳熟能详的例子，它说明《年表》记事也存在为周天子讳的思想倾向。

⑦ 《史记》卷 14《十二诸侯年表》，第 670 页。

⑧ 《史记》卷 15《六国年表序》，第 835 页。

⑨ 《史记》卷 15《六国年表序》，第 835 页。

⑩ 《史记》卷 5《秦本纪》，第 254 页。此事在《史记》中共有四处反复书写(其余三处分别见《周本纪》《封禅书》与《老子韩非列传》)，足见司马迁的重视。

霸”一事几乎未有绕开过。至于黄淳耀所说的宋襄公,实未受到同等对待。作为“嵌入型文本”,“宋襄公卒”在《世家》中仅一见(《齐太公世家》),这其实正能说明《年表》何以将宋国特置于齐、晋、秦、楚之后。司马迁的历史叙事原则前后可称密合。

四国之中,齐、晋尤需注意。《年表》晋景公十二年(前588)书“始置六卿”,昭公六年(前526)书“六卿强,公室卑”,顷公十二年(前514)书“六卿诛公族,分其邑。各使其子为大夫”。^①司马迁多次关注晋国六卿,一方面描绘了晋国分合变化的关键,另一方面更为《六国年表》魏、韩、赵的分栏奠定了叙事的基础。至于《年表》齐桓公十四年(前672)书“陈完自陈来奔,田常始此也”,简公四年(前481)书“田常杀简公”,平公元年(前480)书“齐自是称田氏”,^②旨在表明田氏的初始、渐盛以及代齐之完成。因而,司马迁之所以反复书写“六卿强而公室卑”“田常弑简公”等,则是要导向“三家分晋”与“田氏代齐”,进而搭建起“十二诸侯”与“六国”之间的内在联系。《六国年表序》说:“三国终之卒分晋,田和亦灭齐而有之,六国之盛自此始。”^③在司马迁看来,三国分晋与田氏灭齐正是“陪臣执国命”时代的关键开启点,此下则与“诸侯力政”的春秋时代展现出根本不同。但此关键点绝非无所从来,从“六卿”到“三国”,从田常到田和,此即司马迁所认为的两个时期的连续性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所构建的《年表》“始终”从来不是在时间上完全封闭的,而是对“未来”保持着高度的开放性与指向性。

最后来看“孔子相鲁”与“孔子卒”作为“嵌入型文本”的关键地位。赵翼指出:“凡列国《世家》与孔子毫无相涉者,亦皆书‘是岁孔子相鲁’、‘孔子卒’,以其系天下之重轻也。”^④此固合理,但作为《世家》时间线中的“孔子卒”,以及《年表》时间终点的“孔子卒”,其意义尚可深求。《年表》的时间范围是“自共和迄孔子”,所以在司马迁看来,“孔子卒”意味着一个时期的结束,此下则是局势完全不同的六国时期。因而,《世家》时间线中的“孔子卒”绝非一个简单的历史事件,而是一种具有结构性意义的标示性文本。倘谓“孔子卒”的重复书写仅表示司马迁对孔子的景仰,那么有关《史记》春秋叙事的理解势必难称到位。

需要注意的是,《年表》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孔子卒”后还有两年,最后一年为周敬王四十三年(前477),该年“周”栏记事为“敬王崩”。^⑤是何原因导致司马迁将“孔子卒”而不是“周敬王崩”视为这一时期的终点?他为何不在《年表序》中自陈“自共和迄敬王”?《年表序》说:

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决。^⑥

此处联结了“厉王出奔”与“孔子作《春秋》”。这种联结在《史记》中多处存在,如司马谈在临终之际

① 《史记》卷14《十二诸侯年表》,第760、792、799页。

② 《史记》卷14《十二诸侯年表》,第713、817、818页。

③ 《史记》卷15《六国年表序》,第835页。

④ 赵翼:《陔余丛考》,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2页。

⑤ 《史记》卷14《十二诸侯年表》,第820页。

⑥ 《史记》卷14《十二诸侯年表序》,第647—648页。

说：“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废，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①再如《儒林列传》：“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故（孔子）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②《太史公自序》载：“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③又认为：“周失其道而《春秋》作。”^④显然，司马迁将“厉王出奔/周室衰微”与“孔子作《春秋》”这两种历史叙事联结在了一起，并以此奠定了春秋叙事的“始”与“终”。李纪祥认为：“正是因为幽厉之后的周道缺、礼乐衰、王室陵夷、诸侯力政、陪臣执国命、礼乐征伐不自天子出，才有孔子的仁以为己任，修《诗》《书》，作《春秋》，以为天下之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⑤这种对于司马迁周史观的认识颇为精准。

因而，通过与“周道衰微”的联结，“孔子相鲁”“孔子卒”的“悲剧”意味也就显现出来了。这种悲剧意味一方面来源于孔子相鲁但未能实现王道抱负，此后“干七十余君，莫能用”，只能退而作《春秋》，另一方面则来源于司马迁自身对悲剧命运的敏感。他将“孔子厄陈蔡，作《春秋》”视为“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的例证之一，^⑥原因即在于此。设若司马迁以“周敬王崩”作为这一时期的终点，那么由“周道衰微”至“孔子卒”这种基本叙事结构必然会遭到破坏，司马迁预设的“悲剧”叙事情节也就无从谈起。

理解了“孔子卒”的特殊地位，也就能理解“鲁隐公初立”“鲁隐公被弑”作为“嵌入型文本”的意义。这两个文本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们是《春秋》开端的重要事件。司马迁将这两个文本反复书写的目的，固然在于呈现春秋时期的第一次国君被弑，但更重要的则在于凸显作为经典的《春秋》之“始”。司马迁想要表明的是，从鲁隐公开始，进入了孔子《春秋》叙事的时间范围，孔子“匡乱世反之于正”的事业正式开启了。^⑦

至此，结合上文对“嵌入型文本”的分析，《史记》春秋部分历史叙事的主线已经展现出来了（见图1）。

图1 《史记》春秋历史叙事主线

① 《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第4001页。

② 《史记》卷121《儒林列传》，第3785页。

③ 《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第4003页。

④ 《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第4017页。

⑤ 李纪祥：《从宗周到成周：孔子与司马迁的周史观》，第17页。

⑥ 《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第4006页。

⑦ 《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第4017页。

在这一主线之中,每一个事件都不是孤立的事件。“共和行政”展现出对于“三代”的一种转折,它代表了一个宏大叙事最初的开启;“孔子卒”也绝非一个人物的卒年记录,而是一个包含了历史叙事情节和历史哲思的叙事终点。同样,对于《史记》中多次出现的“秦始皇列于诸侯”“齐桓公始霸”等文本,我们也不能简单视为历史事件的记录,它们其实都是一种巨大结构中蕴含特殊意义的点,其意义必须置于主线之中才能朗现。这些历史事件大多已经出现在《春秋》和《左传》之中,但从司马迁开始才真正赋予它们(鲁隐公除外)以结构性意义。这是司马迁超越此前历史叙事的一大关键所在。

四、结语

上文所分析的这一叙事主线既潜藏于《年表》之中,也潜藏于相关《本纪》《世家》的叙事之中。它能更好地解释为何《年表》周之后为鲁,而鲁之后为齐、晋、秦、楚,此后才是其他八国。“共和行政”位于“周”栏,“孔子卒”位于“鲁”栏,一始一终,本身即说明周与鲁的特殊地位。假若将“周敬王崩”作为《年表》终点,不仅未能凸显鲁国的重要性,而且必使《史记》春秋叙事的结构遭到严重破坏。齐桓、晋文、秦穆、楚庄迭为霸主,司马迁不仅在《年表》中抬高四国的地位,而且在相应栏位中重点书写了四位君主,此即司马迁苦心孤诣之处。而产生自其他八国的“嵌入型文本”极为有限,说明它们在天下大势变迁中处于一种次要地位。它们在《年表》中的位置也正与此相符。

上述主线也塑造了相关《本纪》《世家》的历史叙事。司马迁所描绘的春秋时期诸国史,尽管对象各有不同,但在叙事情节的预设上大致相通,都带有鲜明的从“周室衰微”至“孔子卒”的悲剧叙事基调。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他是在“记录”周王室与各诸侯的历史,倒不如说他将不同国家的史事“容纳”进这一主线之中。这种反复强调与书写,不仅使得周王室与各诸侯史事具有了更为紧密的时空联系,而且使它们处于一种相互牵引而饱含张力的网状结构之中。

叙述至此,我们也可以看到,“表”体对于《史记》全书的重要性不仅体现于它合理应对了“并时异世,年差不明”的实际问题,弥补了其他体裁的内在缺陷,而且还体现在它实际参与了《史记》其他体裁的编纂,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史记》相关篇章的历史叙事。“表”体的这一功用有助于我们理解它与其他体裁之间的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也有助于我们感知司马迁思想中的宏大精微之处。倘若我们能在结构、文本与叙事的视角下重新审视《史记》“十表”,也许“表”体与其他“四体”之间的关系还能获得更进一步的讨论空间。

(作者赵四方,浙江大学历史系助理研究员;邮编:310012)

(责任编辑:廉敏)

(责任校对:张旭鹏)